

目 录

凤凰山区武装斗争概述.....	曾宪新 (1)
杨士曼生平回忆	杨青山 (7)
再谈唐绍仪之死	沈 醉 (11)
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 件事.....	唐有淦 唐观挺 (20)
唐绍仪诗文两则	唐仕进 (31)
前山中山纪念亭建修睹闻	刘宝铭口述 苏鼎常整理 (36)
孙中山好友唐雄生平补遗	唐益连 (39)
南中国海第一对机器渔船 ——流动渔民黄三改革渔船的事迹	黄海志回忆 何志毅整理 (42)
梁镜清倾家助革命.....	唐史文 (49)
唐颖坡创办中山县六区中学的 经过.....	梁志坚 (50)

翠微小学校史沿革·····	李大节	(55)
金山学堂纪略·····	卢观发	(60)
三灶岛简史·····	梁振兴 温立平	(63)
珠海境内的古代军事遗址·····	唐振雄	(74)
关于原属香洲管辖的二十一条 村庄·····	管荣光	(78)
珠海地震史料述录·····	沈锦锋	(82)
珠海地区明清科举人名录·····	林世敬	(87)
汪精卫坟墓发掘目击记·····	唐康馥	(95)
稿 约·····		(98)

凤凰山区武装斗争概述

曾 宪 新

凤凰山座落于珠海前山、唐家、香洲三角中间地带，东濒南海，与中山市的五桂山、竹篙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主峰海拔四百多米，山间青云缭绕、林木掩映、瀑布飞流，为古游人向往、墨客留连的胜地。山上有一奇洞，宽敞平坦，不少探胜者在此留下墨迹，“连峰飞嵒崒、真觉凤凰栖；峭壁凝千斤，流云暗一溪；瀑声天际落，林映枝头低；日晓下山去，苍茫路渐迷”的诗句仍清晰可辨。由于这里山势巍峨，峰峦突兀，在军事上迴旋余地大，周围鸡山、杨寮、银坑、神前、山场、华子石、翠微、东坑等村庄，远离反动势力的中心地区。这些村庄，经过我党领导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群众基础较好，因此，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凤凰山建立革命武装根据地，为中山县（辖今珠海市和中山市）革命根据地之一。

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山县委恢复了组织，我党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队）等抗日武装，也先后成立。一九四〇年初，国民党中山县当局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取消了我党领导抗日武装的合法地位，我抗日武装

被迫转入地下。同年三月，中山县城石岐第二次沦陷，县委根据当时对敌斗争的形势，决定将武装抗日斗争的重点从城镇转移到农村，从平原转移到山区，从公开转移到隐蔽。一九四一年，五桂山区已成为我党武装主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重要据点。期间，我抗日武装也多次开进地处中山县五、六区（今珠海市唐家、金鼎、前山三镇及中山市一部分）的凤凰山区，开展抗日武装活动。一九四二年，五桂山抗日民主根据地正式成立，同年，欧初同志领导的五桂山抗日武装主力——中山县抗日游击大队，派出一中队中队长罗章友、中队副彭福胜、杨日璋、指导员黄智、谭生等同志，先后三次进入凤凰山区的东坑村，筹建凤凰山区革命根据地，后因敌强我弱而退回五桂山区。一九四三年八月，谭生同志率领八人的武装工作队，从五桂山区来到东坑村，与该村坚持抗日活动的二十二名民兵汇合，正式成立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大队“白马队”，由谭生任队长，唐森为训政员，“白马队”以凤凰山区为据点，白天练兵，晚上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打击汉奸，队伍很快发展为一百多人。根据五桂山区指挥部的指示，“白马队”在凤凰山区举办了三期（每期一个月）军政训练班，为游击大队输送了二百多位同志。在歼敌除奸的过程中，“白马队”的经费基本上自给。一九四四年初，凤凰山区革命政权正式成立，由甘保方（甘伟光）、王河（女）分别担任正副区长。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支援抗日游击战争。

“白马队”在南屏、前山、界冲等地多次组织了抗日除奸的军事行动，先后三次袭击了前山的日伪军据点。其中第三次袭击时缴获枪枝五十支，粮食二十多万斤，动员了四百名

群众搬运。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八日，“白马队”配合五桂山的部队，袭击汉奸李辅群（绰号李朗鸡）、卢汉荣驻在翠微的五、八区护沙总队，仅七分钟便结束战斗，俘虏伪小队长以下一百二十人，缴获机枪二挺、长短枪一百三十五支，子弹七千余发，其它军用物资一批。同年一月初，日伪军出动兵力九千人，对我五桂山、凤凰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十路围攻”，叫嚣在一个月內消灭我抗日武装。我抗日武装在抗日游击战略战术的指引下，历时五天就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白马队”在战斗中击毙日寇二十多人，伪军一百多人，缴获步枪十八支。同年二月八日，“白马队”配合大队袭击唐家伪密侦队梁孔先部、毙敌十一名，俘虏七名，缴获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一批，伪队长梁孔先只身逃脱，伪乡长梁鼎先葬身火海。

一九四四年十月上旬，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正式成立，中山县的抗日武装力量扩编为珠纵第一支队，凤凰山区的“白马队”归珠纵一支队指挥。同月下旬，珠江纵队中山县行政督导处成立，下属四个抗日民主政权，由甘保方（甘伟光）同志任主席的凤凰山区政务委员会，是原县四个民主政权之一。

一九四五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凤凰山区抗日武装抓住战机，配合五桂山主力，多次对敌伪进行了主动出击。三月十八日，“白马队”与“珠纵一支”的民族、雪花等中队联合行动，在当地人民群众出动三十辆自行车的支援下，仅五分钟就全歼了伪驻前山的特务队陈洪部，其后又在兄弟部队和七百多名群众的配合下，一举全歼古鹤的伪郑屈部一个中

队，缴获机枪二挺、长短枪四十六枝、子弹一千四百发、伪钞票五万元，稻谷一万斤，自行车六部，俘敌四十人，经教育后每人发一千元予以遣散。日伪军在处处被动挨打的情景下，垂死挣扎，于五月八日出动了日军一千人，伪三十四师二千人，“曲线救国军”肖天祥、曾雄部近千人，对五桂山区进行大规模“清乡”。驻唐家、拱北日寇及驻坦洲的黄祥、黄汉、曾鹤华伪军共三百余人，闯进凤凰山区。我抗日军民顽强抗击，经过十多天的浴血战斗，粉碎了敌人的“清乡”阴谋。其后，我五桂山、凤凰山区军民，配合全国各大战场的战略反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凤凰山区抗日武装根据地涌现了一批英勇杀敌的战斗英雄，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务生、大何、容渭宾（女）等。文化教员杨纬学同志，在一次执行任务的途中遭敌人伏击被捕，受到敌人严刑拷打，宁死不屈，最后光荣牺牲。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敌人袭击“白马队”，副队长冯培正同志指挥部分干部战士掩护部队突围，在战斗中与二十名战士一起壮烈牺牲。

一九四六年，我珠江纵队主力根据抗战胜利后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奉命北撤转移。五桂山区、凤凰山区的部队也大部分随队北撤。留下的部队由新成立的珠江纵队中山特派室领导，特派室由曾谷任政治特派员，甘生任军事特派员。凤凰山区留下的部队组成武装工作队，由吴当鸿任队长。

一九四六年六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议，发动内战。中山县国民党军队配合蒋介石集团对我解放区全面进攻，出动了六个团共三千多人的兵力，大举向五桂山、凤凰山根据地进行“围剿”。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烧杀掳掠，推行

保甲制度，企图迫使我人民武装无藏身之地。中共珠江地委和中山县委，于年底转移澳门。凤凰山区武工队根据中山特派室的指示，决定疏散队伍，俟机反击，从原来队伍中挑选了三十多人，组成短枪队，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在敌后除奸反霸，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武工队的频频打击下，国民党在山区建立反动政权的阴谋一直没有得逞。

一九四七年起，凤凰山区武工队在对敌斗争中不断壮大。银坑、鸡山、杨寮、里外神前、东坑、水涌坑、会同、那洲等村庄先后恢复了民兵组织和党组织。

一九四七年秋，我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凤凰山区革命武装，开始集结队伍，主动出击敌人，于中秋节前后，先后镇压了唐家的原日伪侦缉队长、抗战胜利后仍鱼肉人民的唐凌聚和作恶多端的敌那洲乡乡长古云灿，接着袭击了鸡山乡、淇澳乡的敌军驻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大战场的反攻。

活跃在凤凰山区的人民武装，接二连三地袭击敌人，引起反动派的恐慌和疯狂的挣扎。一九四八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日，细雨飘飘，寒风凛冽，反动派纠集了三百多人的兵力，向凤凰山进行疯狂的扫荡，我人民武装分散转移，留下七位同志坚守在凤凰山石洞内，敌人折腾了一夜，一无所获。次日清晨，敌人仍包围着整个大山，派兵到处搜索，发现我七位同志隐藏石洞，企图攻入洞内，由于洞口狭窄，仅容一人侧身出入，敌人一出现在洞口即被击毙。国民党见攻不下，又用松枝、茅草塞在洞口，然后浇灌汽油、煤油火攻，但洞内深宽且直通山顶，烟火向上升，洞内的同志安然无恙。敌人无法可施，就封锁洞口，日夜派兵把守。企图将我困毙于

洞内。经过五天后，我七位同志机智地从山顶洞口安全撤出。敌人围困了半个月才发觉，只好撤兵。

一九四九年四月，党组织为山区革命根据地转送来了一批中山大学的革命青年学生，壮大了山区的革命武装力量。这些青年学生政治水平高、思想坚定，作战勇敢，善于做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对发展山区革命政权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关川同志，原是中大的地下团员，入伍后积极靠拢党组织，在石门遭遇战中英勇牺牲，被迫认为中共党员。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并为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山区根据地于五、六月间举办了干部训练班。

一九四九年八月起，我五桂山、凤凰山人民武装，开始从山区向平原挺进，不断向盘踞在中山县各地的反动势力发动攻势。北撤后已成为人民解放军主力的原珠江纵队一部分同志，这时也随大军南下。中山解放前夕，原在五桂山区工作的谭桂明同志率领的原五桂山北撤部队的部分干部战士，先行回到中山县，与五桂山、凤凰山地方人民武装汇合，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两广纵队中山独立团，军威大振，以摧腐拉朽之势，横扫中山县各反动武装，在崖口一举歼灭敌保安营谢湛强部的一个整连。国民党军队闻风丧胆，军政要员纷纷撤离中山县城石岐，向港澳逃窜。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人民武装部队浩浩荡荡开进石岐，中山县正式宣告解放。

革命根据地凤凰山，作为我市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高高飘扬，革命者在这里创造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本文撰写过程中，承蒙原在凤凰山区从事武装斗争的甘伟光、谭生同志指导，谨此致谢）。

杨士曼生平回忆

杨 青 山

大革命时期，原籍香山县北山村（今珠海市南屏镇北山村）的杨匏安（革命烈士、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杨章甫（一九二二年入党）、杨广（即杨青山，一九二四年入党）、杨士曼（一九二四年入党）、杨杏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大革命时期与陈郁同志结婚）等五位青年，是这场革命斗争中的活跃分子，当时有人称为“北山五羊”（杨）。杨匏安烈士的事迹记载已颇详，杨章甫事略，本人曾忆述一稿刊于《珠海文史》第二辑。杨杏娥的事迹本人只知她曾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经营救出狱后一直住在陈郁同志家乡宝安县南头村，后来情况不详。至于杨士曼，他长期以来与我过往甚密，解放后两人均在北山家乡生活，现根据记忆，将其生平略述如下。

杨士曼（一九〇一——一九七五）原名士万，又名子任，字编祥。一九〇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生于北山乡，论辈份他是杨匏安的亲叔。士曼父训常，生有十三子女，长子杨富祥即为杨匏安之父，士曼排行十三。由于士曼是庶出，与匏安父富祥年龄相距大，故匏安反比其叔士曼长五岁。不过由于年纪相仿，又志趣相同，匏安、士曼、章甫（论辈也是匏安族叔）、杨广均与兄弟相处，不分辈分。后来，杨匏安和杨章甫均赴日本游学，士曼则仍留家乡，就读小学。

一九二一年，杨匏安住在广州越华路的杨家祠，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工作。当时广州正拆卸城墙修筑马路，杨士曼在家乡北山高等小学堂毕业，经测量局任技师的同乡杨北熙介绍来当“测夫”（测量职工），同杨匏安住在杨家祠。杨士曼受杨匏安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接触革命，一九二三年三月由阮啸仙同志（革命烈士，曾任广东团委书记、广州农讲所主任、党中央宣传部长）介绍参加了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广东“新学生社”，八月转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又由阮啸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改组后的国民党组织部由共产党人谭平山任部长，时谭平山兼任中共在国民党中的党团书记，组织部的许多工作由担任秘书的杨匏安负责，杨匏安曾一度任代部长和国民党中常委。杨匏安把杨士曼安排到组织部协助工作，具体工作是协助物色和选派国民党左派骨干到有国民党组织的省、市、学校、军队和海外，重新改组和成立国民党各党部、特别党部和区分部，以贯彻执行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壮大我党的革命力量。

一九二五年六月省港大罢工爆发，杨士曼一度从组织部抽调出参加省港罢工委员会，负责宣传和接待事项。六月二十三日，杨士曼参加广州各界人民的反英示威游行，当游行队伍抵达沙基时，英帝国主义分子突然开枪扫射，我游行同胞牺牲甚众，这就是英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惨案中首先中弹牺牲的是黄埔军校学生军的曹营长。在枪声中，杨士曼转到骑楼砖柱躲避，才免于难。

一九二六年五月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

在会上提了个“整理党务案”的提案，陈独秀等竟退让接受，这样共产党人要退出国民党领导机关，谭平山、杨匏安不再在组织部任职，由蒋介石兼任部长，叫张静江代理（后任部长），秘书是陈果夫（后任代部长）。陈果夫到任后，因为业务不熟，想留下杨士曼，条件是要杨士曼退出共产党，杨士曼不答应，党组织把他调回省农民协会工作。

一九二七年四月国民党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时杨匏安已赴武汉，白色恐怖中杨士曼跑到他熟悉的朋友家中躲了几夭，其后又搭船逃到澳门，又从澳门回到了北山村。不久杨匏安从汉口来信，邀请杨士曼等人北上。于是杨士曼、杨广、杨士品等四人立即动身前往汉口，可是刚抵达汉口时，汪精卫已公开“分共”，四人只好返回香港，找到了转移来香港的广东省委机关，省委负责同志杨殷是同县（中山县、翠亨人），与士曼四人都很熟悉，他把杨广留在省委机关任通讯员，杨士曼被分派到澳门，协助杨章甫收容大革命失败后来澳门的同志。广州起义期间，杨士曼与杨章甫在澳门传递革命讯息，接待广州来的同志。

广州起义失败后，港英当局配合国民党通辑共产党人，省委指示保存力量，化整为零，于是杨章甫、杨士曼等均分别寻找工作，杨士曼经简琴石（国民党广东省商人部长）介绍到广州颐养院工作一年，仍然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一九二九年，广州起义时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潘兆銓同志，受党指派从日本回到中山县的雍陌，与在当地任教的杨章甫（他俩是老战友）取得联系，恢复了党的组织工作。杨章甫把杨士曼、杨广介绍回三乡教书，共同组成一个党支部，由潘兆銓同志任书记，不久潘兆銓同志遭敌人逮捕杀害，杨章甫、杨

士曼想通过杨匏安、杨殷寻找党组织，但杨殷、杨匏安也都已经牺牲，于是杨士曼、杨章甫等与党失去联系，走上自谋职业的道路。

从一九三一年起杨士曼转到新会县的松山乡当教师，一九三四年又到虎门炮台任教，兼任炮台政训员，经虎门要塞司令李洁芝（现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保荐入广州燕棠军校学习，后来陈济棠倒台，杨士曼又转到兴宁、五华、云浮等地参与钨矿业管理。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曾派员寻找大革命失败后的同志，杨士曼见到廖承志同志提出要到延安，廖承志同志指示仍留白区等待时机，故士曼转辗多年，才在一九四九年夏返回北山村。同年十一月，为迎接解放，士曼在村中发动群众，筹集粮食支前。解放后积极协助党和政府实行土地改革，被委任为北山乡临时乡政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他一直担任农村基层干部，一九七二年身患瘫痪至一九七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逝世，终年七十四岁。

士曼先后两次结婚，元配裴贞一，满族人，一九二六年冬在广州与士曼结合，生有子女七人，一九五〇年去世。继室梁好生子女四人。现有子女七人中四人在国防、卫生、银行部门任职，其余在家乡。

再谈唐绍仪之死

沈 醉

唐绍仪于一八六〇年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唐家镇（现属珠海市辖）。一八七四年官费派赴美国留学。一八八一年回国后，出仕清廷，先后任公使、侍郎、巡抚、尚书及南北议和代表等职；民国成立后为第一任内阁总理，后为孙中山在广州组织的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政务总裁、南北议和代表等职；晚年出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兼中山县县长。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国民党军统特务刺杀。

对于唐绍仪之死因，社会上众说纷纭。

一曰，唐绍仪当时奉介蒋介石之命，同日本人秘密和谈，而日本人认为蒋介石不可靠，要蒋下野，并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发表声明，不以蒋为谈判对手。蒋极为震愤，误以为唐绍仪欲取而代之，故派人将其刺杀而死。

或曰，唐绍仪晚节不忠，在上海暗中与日伪来往频繁，密谋策划，准备建立伪中央政府，故被蒋杀之。

有的人则认为，唐绍仪之死与其女婿岑德广利禄熏心，私允日本人所提条件有关。而唐本人尚在梦中。

还有一种说法则是认为唐绍仪保持了晚节，并无汉奸之嫌。只是军统特务戴笠、周伟龙、赵理君、谢志磐等人邀功

心切，瞎编了一些与日本人往来，准备出任维新政府首脑人物的情况，并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而被误杀。

而军统头子戴笠以及其好友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却坚持说唐绍仪是汉奸，故军统派人杀之。

总之，围绕唐绍仪被杀的问题，各持己见，从而使这一历史事件更加扑朔迷离，难以定论。

为了给历史研究提供素材，也为了进一步促进海内外统战工作的发展，广东省珠海市政协和暨南大学历史系共同对唐绍仪的历史资料进行了初步的收集和研究；并于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珠海市联合举办了《唐绍仪史料研讨会》，邀请了全国的有关省、市的史学研究部门的教授、专家、学者和图书资料工作者前去参加会议。我亦在被邀请之列。

这是一次有史以来，有关唐绍仪史料的全国性的研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及史料、档案工作者共四十多人。其中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馆长徐艺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万仁元、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丁身尊、广东社科院副院长金应熙、张磊以及刘德麟、王玉璞、廖钺、米新夏、黄美真、余炎光、周孝中等著名学者和教授。会议由珠海市政协主席何海、副主席李长青、副秘书长梁友鹏以及暨南大学副校长李炳熙主持。与会人员经过了两天半的热烈研讨，谈资料，摆事实，基本上统一了观点。

研讨会上，我亦将自己掌握的材料和观点作了汇报，现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及见解告诸读者，以供读者或史料工作者参考。

一、唐绍仪被杀之前

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之后，日本特务机关便拟仿效华北，成立伪政权。当时，日方认为“维新政府”的首脑梁鸿志号召力小，不足以维新沦陷区统治。所以，把南方的唐绍仪，北方的吴佩孚作为重要争取对象，利用他们为南北伪政权之首领，以资号召，当时有〔南唐北吴〕之说。

日本方面之所以选中唐绍仪，是考虑其以往的威望和当时的地位，认为他是最有代表性的理想人物。最初是日特头子影佐祯昭和前日本首相犬养毅之子养健不断设法对唐绍仪进行拉拢。最后，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亲自前往劝说，并让他起草所谓的“和平通电”。这样，唐绍仪准备出山，组织伪政府的说法，不胫而走，传说纷纭。但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大美晚报》报道说，当时唐绍仪在上海接受英国记者采访，对外界传说他将参加“临时政府”的事加以绝对否认。又说他在“一生政治生活中，对于外间任何谣传，向不声辩，而以事实为之表现。目下日方所谓彼之意图，全为痴人说梦。”

这一报道并未平息外间的传说，其原因与唐绍仪在上海买房有关。当时，唐绍仪住在上海租界福开森路十八号。那是一幢相当大的花园洋房。自上海战事发生后，在上海的许多达官贵人，豪商巨贾都纷纷向重庆、香港或国外逃走，房价大跌。唐绍仪隔壁一幢很大的花园洋房之房主，急欲离沪，愿以极低的价格出售房屋。当时住在霞飞路一幢小洋房的诸昌年便劝其岳父唐绍仪将隔壁房屋买下，给他们夫妇居

住，可就近照顾唐。唐绍仪便将那幢房屋买下，派人把围墙打通，两座洋房连在一起。这样一来，外间关于唐绍仪无意离开上海，正等待与日本人谈条件，准备出山的传说更甚。

不过，军统决定刺杀唐绍仪却是与军统特务谢志磐、王兴国等人的情报有直接关系。谢志磐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上海沦陷后，他是军统留在上海作潜伏工作的上海特区的一个特务。他与唐绍仪的侄儿唐海安私交很深，经常出入唐家。唐家也将他视为亲戚。但一九三八年春天，谢志磐向军统报告说，日本方面常有客人去拜访唐绍仪。这情报立即引起了军统的重视。上海特区区长周伟龙又加派一个叫王兴国（化名王竹轩、王约瑟）的特务，冒充谢志磐的亲戚，常去唐家，刺探情报。但谢、王二人所了解到的也只是日本方面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去过唐家，具体谈过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

为此，戴笠便请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派其在上海的一些能与唐绍仪接近的人去劝唐绍仪，早日离沪去香港。以免为人误会。唐绍仪曾口头答应一定去香港。所以上海有些小报曾刊出唐将去香港的新闻。这样日本方面更加紧了对唐绍仪的拜访和拉拢。谢、王二人也更加频繁地出入唐家，欲打听日本人见唐的情况。可是，他们仅了解到一些表面情况，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因每次唐绍仪与日本人谈话时，不许家中任何人在场。有时谢、王二人被军统追问急了，就编造了一些想当然的假情报。这些假情报颇被军统重视，并发给谢、王奖金，以资鼓励。他们更加忘乎所以，真真假假的情报说了不少。（此话是后来参与刺杀唐绍仪的特务赵理君在重庆军统局任行动科长时，亲口对我说的。）军统将这些情报呈送

给蒋介石。蒋看后也很重视，便分别嘱人向唐函电邀请，希望他能与“国府”同仁，共御国难。对此，唐绍仪对有的函电敷衍一番，答应离沪；对有的函电却置之不理。

日本人的频繁拜访，谢、王的情报，加之唐的留沪购房等事，造成了唐绍仪即将登台出山，为日本人充当傀儡之势。蒋介石担心日本人不以自己为和谈对象，所以，口谕戴笠，在必要时将唐绍仪杀掉。

二、唐绍仪被杀经过

戴笠奉谕之后，即令军统上海特区副区长兼行动组长赵理君（化名陶士能、赵立俊）率领组员李阿大等与谢志磐、王兴国一起伺机行动。

一九三八年九月下旬，日本特务土肥原再次到唐宅，与唐绍仪见面并秘谈。此事便促使赵理君等加紧行动。于九月三十日上午九时廿分赵理君等冒充古董商，随谢志磐、王兴国一起，假送古董之名，驱车来到唐宅。唐绍仪当时已经七十八岁，甚爱收藏古玩。特务即利用此嗜好，送去十来件古玩，其中有一很大的玛瑙花瓶，甚为名贵。特务将无声手枪和一把利斧藏入花瓶内，带入唐宅。因谢、王二人为唐家常客，故唐绍仪的两个白俄保镖和佣人都没有在意。赵理君与谢、王二人进入客厅，李阿大等特务在门外汽车上等候接应。当佣人前去通报唐绍仪之际，赵理君等迅速将客厅各烟灰缸上的火柴装入衣兜。当唐绍仪出来，请他们抽烟时，发现没有火柴，即令一旁的佣人到厨房去取，他自己则低头欣赏古玩。特务趁机用利斧砍伤唐绍仪头部。唐当即倒于客厅内。赵、谢、王三人拿起古董从容走出客厅，赵理君还煞有